

论戴震的佚著《经雅》

胡 锦 贤

《经雅》是戴震辨释草木鸟兽虫鱼之名，而没有定稿的一部专著。由于这部未刊著作没有见之诸家记载，戴震自己亦未曾提及，因而自清代中叶以来，世间不知有此作矣。

1989年《文献》第一期上登载了方利山同志的题名为“戴震佚著《经雅》的发现”一文，这算是论及戴氏《经雅》的第一篇文章。最近，我有幸受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的委托，校注整理了戴氏的这部未刊著作。通过整理和初步研究，对《经雅》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以我之见，认为方利山同志的文章，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我的这篇文章并不是专为商榷而写；而主要是为了作进一步地研究探讨（恐怕亦难免有失当之处）。

一

《经雅》书稿是近代藏书家徐恕于1959年遗嘱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必须指出的是，《经雅》的发现，实际是1977年国家组织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期，湖北省图书馆在整理书目时始注意到的，当时即给予了专门鉴定，认定《经雅》确为戴震的手迹，1986年出版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四》中即著录了此稿本，题：“经雅 不分卷，清戴震撰，稿本。”这是《经雅》稿本的首次著录，时间早在戴震研究会1987年底来湖北省图

书馆查阅之前。

原件为两册，一函装。封面以篆书题签：“经雅 戴东原先生稿本。”书稿前后无序跋，共四十二页八十四面，每面按八行书写。收录的条目，因统计的方法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包括形状稍异而有不同名称者在内，约五百一十条左右（如《释畜》：“赤马曰骅，赤马黑鬣曰𩇑，𩇑马白腹曰𩇑，𩇑白曰驳”，算作四个条目。同物异名者不算）。全稿分《雅记》、《经雅》两大部分，未标卷次。《雅记》分作两篇，为《释兽》、《释畜》；《经雅》分作五篇，为《释鸟》、《释虫》、《释鱼》、《释草》、《释木》。因其中《释虫》又分为三，《释鱼》又分为二，故虫、鱼两篇分别列有目录，其他各篇均未列目录。《释草》、《释木》两篇凡条目和异名下均标列有注音反切，没有标示出处；其他各篇，凡条目和异名下一一般都标示有书名出处，而无注音反切。条目下辨析名称或形状的内容为正文，用大字单行书写；考辨文字和注音反切，均用小字接正文后双行书写。全稿包括出处文字，近三万言。

原稿是以清秀的端楷书写的。因初作之稿，体例未善，故书稿又作了不少修改，并增删了一些条目。全稿的基本格局大体形成，语句次序也基本理顺。改订的文字为行书字体，有些文字较难辨认。

书稿开卷为《雅记》。“雅记”标题下方有三枚印记，底下的两枚为“南洲”、“继涵之印”，上面的一枚为“翰生秘籍”。正文第六页“经雅”标题下方题：“新安戴震著。”《释鱼》首页有“翰生秘籍”、“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印两枚。稿之末尾有“翰生”、“故才高者，菟其鸿裁”（用《文心雕龙·辨骚》中语）两枚印章。又扉页与稿中间各有“潍县高翰生藏经籍”印一枚。

据原件上的印记，知稿本原为曲阜孔继涵所藏，“南洲”是

孔继涵的别号（据《阙里文献考》）。孔继涵与戴震友善，而且是亲家，梁启超谓戴氏遗著“多存曲阜孔继涵家”，“孔氏拟尽刻先生书而未能，已刻者名曰《戴氏遗书》，凡十五种。”（见《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戴震死后六年，孔继涵亦去世，在这六年中书稿有无流出，孔广森是否见到过《经雅》，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中未曾提及，因而《经雅》何时流出孔家，目前尚无考。据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戴氏直隶河渠书跋》，曾谓孔继涵所藏戴氏书稿，“光绪甲申（1884）年尽出”，《经雅》之稿是否此时流至高鸿裁手中，亦未可知。

《经雅》得以保存于湖北省图书馆，是徐恕的一大功劳。徐恕字行可，武昌人，藏书近十万册，于1956、1959年全部献给了新中国。其事迹见《清代藏书楼发展史》、《湖北省图书馆收藏名家藏书纪事》。今访徐恕之子徐孝宓先生（前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徐谓其父藏书并不图名，收书得书亦未留下记载，所献书中有许多都没有盖上徐氏家印。其高风亮节可见。至于徐家具体何时何缘得《经雅》的，已不可考。

二

关于《经雅》的写作时间，虽无文字记载，但还是有迹可考的。据几个方面的材料推测，《经雅》当是作者早年的作品。

戴震晚年作书与段玉裁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见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欲闻古圣贤之道，当先通《六经》语言。关于戴震的这一治学主张的确立，在戴震的早年作品中有所反映。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

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是仲明论学书》作于乾隆癸酉（1753），戴震时年三十一岁。

戴震接着又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略引）

洪榜《戴先生行状》亦论及此事，曰：“……凡《经》之难明，有此数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其学弥博而探指弥约，其资愈敏而持力愈坚，年二十余而《五经》立矣。”

从这几段文字可知，戴震自十七岁时为闻道而从事字义、制度、名物方面的研究，为之十年，做了上述若干事，“渐于《经》有所会通。”按这十年所做若干事，《经雅》正为辨析鸟兽虫鱼草木名状而作，就应当是在这一阶段写作的。这十年是戴震潜心训诂而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完成这一阶段，才会“于《经》有所会通”。戴震约在二十七岁时完成这一阶段的研究，故洪榜谓“年二十余而《五经》立矣”。戴震三十一岁时作《与是仲明论学书》，实际是对这一阶段的总结。由此可见，谓《经雅》是戴震十七至二十七岁这一阶段的作品，是合乎情理的。

又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中曾举《尔雅》“杜甘，棠”之例，谓杜涩棠甘，赤棠为杜，白棠为棠，《毛传》“甘棠，杜也”之说，是失其读。并举《尔雅》“黎山，檇”、“榆白，粉”二例为证。而这些在《经雅》中已经有了反映，文字叙

述也基本相同。段玉裁谓《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当作于“乙丑”（1745），此年戴震二十三岁。戴震的“杜甘，棠”之说，又采入他的《毛诗补传》和《杲溪诗补注》之中，文字大同小异。梁启超谓《毛诗补传》与《杲溪诗补注》为同一书。按《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三十一岁时《诗补传》书稿已经成形，只待修订。此旁证之一。

只是戴震的“杜甘，棠”之说，段玉裁并不同意他老师的这一观点（详见《说文解字注》“杜”字注）。但这却又同时证明了《经雅》确为戴震的作品，是无可置疑的。

而从原件上看修订的笔迹，墨色较深，说明修订与初作必相隔了很长的时间。戴震在世只五十五载，这笔迹上的层次亦可说明《经雅》初稿作于戴震的早年。此可为旁证之二。而修订似是比较晚的事，洪榜谓戴震“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得竟”，（见《戴先生行状》）未知《经雅》是否为此时所修订。

三

其书总名为“经雅”，而《释兽》、《释畜》两篇题名为“雅记”。分析原因，“经雅”之名，是作者取《六经》中草木鸟兽虫鱼之名，旁汇先秦诸子、汉魏古籍和传、注、笺，比照《尔雅》体例，辨释其古今雅俗之名，比较经、传、注、笺与《尔雅》之异同，故名“经雅”。

书中所言“经”者，即指《六经》，因《六经》为孔子所整理。而《尔雅》为释《六经》而作。郭璞《尔雅序》云：“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辞，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戴震亦云：“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

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见《尔雅文字考序》）

于是戴震治《六经》名物，以《尔雅》为津梁，贯群《经》而旁汇诸子百氏及汉魏古籍、传、注、笺，综核考辨。草木鸟虫鱼多异名，故辨释以名号，兽畜少异名，则释之以形状，《尔雅》体例本亦如此（参见王国维《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而戴氏《经雅》本为辨名而作，兽、畜少异名，名不足以相释，则主要释之以形，故题名曰“雅记”，以别于草木鸟虫鱼之例。

“记”亦诂训之别名，古人以记命书名者，如《礼记》、《考工记》之类。“雅记”之记，即记其“状类”而已。

作为一部雅学作品，《经雅》与前人雅学著作有无关系？

《经雅》之中多次引用了《埤雅》《尔雅翼》之说，而有一处引用了方以智的《通雅》，说明《经雅》之作，可能受到《埤雅》、

《尔雅翼》、《通雅》等雅学著作的某些影响，而有自己的宗旨和特色。梁启超曾谓桐城方以智的训诂之学，一定对戴震有所影响，看来是有道理的。在清代群雅之中，《经雅》是继方以智的《通雅》、吴玉搢的《别雅》之后的又一部雅学著作，此前人论雅学史所未及也。

四

戴震作《经雅》，虽然是沿着前人的路子走的，但《经雅》的主旨在考辨《六经》中草木鸟兽虫鱼的名实，以为通《经》解《经》之助，因而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特色。

戴震在十七岁时即认为：“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乃定。”（见《与是仲明论学书》）他的这一治学精神，即贯穿于《经雅》全稿之中。《经雅》每考辨一物，即综核条贯群《经》、《尔雅》及诸子百氏、汉儒之传、注、笺之说。

《尔雅》既为《六经》之通释，为何还要旁汇诸子百氏和汉

儒传、注、笺呢？戴震在《尔雅注疏笺补序》中实已讲得明白，他说：“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然或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未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戴震认为，援《尔雅》以证《经》，是因为《尔雅》之前《六经》未残阙，据《尔雅》可以“寻求遗经”。如戴震曾举《释言》“桃，充也”，《六经》无“桃”字。援汉儒之说，是因为汉去古不远，其说可资证实“转写讹舛”。如《六经》无“桃”字，而《说文》亦有“桃，充也。”《书·尧典》“光被四表”，《汉书》、《后汉书》均引作“横被四表”，郑玄注《乐记》亦曰：“横，充也。”戴震据《尔雅》和汉儒所言，知古本《尧典》必作“横被四表”，即本作横，转写作桃，脱误为光。这些即可说明，汉儒传、注、笺可为综考故训之助。而魏晋间大儒，有些亦有师承，如孙炎即受学于郑康成之门人，张揖亦多闻古艺，因而魏晋古籍资料亦往往可为据证。

戴震利用汉魏人的资料，悉心考证，而不囿于旧说，读《经雅》即可见一斑。如《左传·定公十四年》：“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豕？’”杜预、孔颖达均训娄猪为求子猪，训艾豕为老公猪。今《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皆沿袭此说，自杜预以来，竟未曾有过异议。而戴氏《经雅》则释娄猪为家系之猪，艾豕为外舍之豕。且看《雅记·释畜》“豕”下释曰：

“艾豕，外舍之豕也。娄猪，家系之猪也。娄，系也，《公羊传》曰：‘牛马维娄。’何休注：‘系牛曰娄。’娄猪，旧说‘求子猪也’，后人遂以为牝豕曰娄猪。予谓娄猪与艾豕对。艾犹外也，《国语》云：‘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适子殆，社稷危。’韦昭亦以艾为外，谓嬖臣。《孟子》以少艾

与妻子并称，妻子为内，少艾为外也。艾豨指宋朝，为外舍之男，则娄猪指南子，为有系于内者也。”

因《左传》这里讲的是南子与宋朝淫乱之事，故以娄猪比之南子，以艾豨喻之宋朝。旧解娄猪为求子猪，是引申了的意义，从字义上推求，不如家系之猪可靠、贴切。娄猪既为家系之猪，则艾豨训为外舍之豕，比较妥贴，“归吾艾豨”，归即对寄外而言，故戴氏又将艾豨比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寄豨”。寄豨即寄外之种猪。今考桓宽《盐铁论·未通》：“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家，不从力役。”《方言》六：“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或谓之艾。”（参见《礼记·曲礼上》。）据此细心思索，既然五十以上为艾（谓如艾之苍白色），杖于家，不从力役，则气血已衰，何能为淫乱之事？又古以艾为老，是作敬词用，将其用之老公猪，实不当。可见戴氏《经雅》的训释胜于旧说。然而戴氏的这一说解，一直鲜为人知。

戴震以古小学存于今者，惟《尔雅》、《方言》、《说文》数家，曰：“自《尔雅》外，惟《方言》、《说文》切于治《经》。”（见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故《经雅》中除《尔雅》外，多援用《方言》、《说文》之说。如《经雅》中常有“某地谓之”，即多取之《方言》。有《尔雅》失其传者，则求之《方言》、《说文》，或益之《广雅》。如《经雅·释草》“绥”下释曰：“《说文》云：‘（蔞），藿属，可以香口’。是也。”绥即蔞之借字，《仪礼·既夕礼》：“实绥泽焉。”郑玄注：“绥，廉藿也。”《广雅·释草》：“廉藿，蔞也。”故《经雅》释曰：“绥，藿属。亦作蔞。”而《尔雅》无此义。诸如此例，不一而足。

《经雅》于草、木两部分的注音反切，主要录自大徐本《说文》（即取《唐韵》），《说文》无者即取之《广韵》。其中，偶有改字。标音亦是辨名，戴震早年曾研究《切韵》之学。戴氏

于草、木两篇标音，并附列异体字，大抵因这两部分的名称古今音读常有不同，异名和异体字甚多。所列异体字，多见于《说文》。可见戴氏于这两部分尤注重六书之说，以穷源知变。

《经雅》释名术语的运用，一般以古谓之、《尔雅》谓之、亦谓之、或谓之、某地谓之为序。“古谓之”指古籍中所记上古之词，如少皞时常以鸟名为官名，《左传》记之，即予以反映；还有《诗》中所记之商时语，如《经雅》“梟，古谓之流離。”流離见《诗·邶风·旄丘》，梟见《诗·大雅·瞻印》，虽同见于《诗》，但流離为商周时古黎人语，故云。又如“鸛，古谓之鸛。”鸛见于《诗·大雅·旱麓》，为文王时语。郭璞注《尔雅》，以周代为中古，故上古之词曰“古谓之”。《尔雅》代表的是周代雅言，即当时的社会通语和当时古籍中的常语。“亦谓之”指同一书中的异称。“或谓之”一般指诸子、汉魏古籍和传、注、笺之词。“某地谓之”，则是取诸《方言》。如此综核条贯，读一物而其古今雅俗之名、群《经》之异同可见。虫、鱼、鸟、草四中亦常有“《夏小正》谓之”，是因《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月令，故戴震将《夏小正》之说特别地标出。戴震曾说：“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鉅细毕究，本末兼察。”

（见《与姚孝廉姬传书》）又说：“最要体会‘条理’二字，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见段玉裁《戴先生年谱》引）他的这一“条理”精神，在《经雅》里无处不体现着。

《经雅》释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及辨其同异的具体方法，亦如《尔雅》体例，或取诸其物之形，或取诸其物之色、味、声、大小、牡牝、功用、生活习性等；或以双名释单名（俗名多偶，雅名多奇）或辨之总名与别名，或辨之通言和常语，或辨之双声与叠韵。此外，分类更加以条理，如释马一项，又按黑、白、赤、黄等基本色调加以分类，铁骊、青骊均统列于黑马条下，白马黑

鬣曰骆、彤白杂毛曰猓，均统列于白马条下，便于诵记。鸟、兽两部分注意利用了司马相如《赋》，《赋》中所述鸟兽，基本予以收列。全书注重名实的考辨，略于形状。考辨注意参考《汉书音义》、《史记》三家注、《唐本草》、《埤雅》、《尔雅翼》、《本草纲目》等成就较高的著作。说解注重实证，去其芜杂，释文十分简练。

五

《经雅》一直未得刊行，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此非戴震精神专注之作，未成定稿。戴震之后学焦循谓“东原生平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余尝究东原说《经》之书，如《毛郑诗补注》等篇，皆未卒业，则非精神所专注”。（见《雕菰集·申戴》）梁启超谓“先生著作最矜慎，凡自认为‘未至十分之见’者，弃之不稍顾惜”。这些亦道出了《经雅》未成定稿的原因。戴震的生平宏愿在作《七经小记》，以阐述古圣贤之道，可惜中寿夭逝，未能卒业。按戴震的志向，最要紧的是《孟子字义疏证》之类论道之书，“此正人心之要，不得不作”，其他说《经》之书，不过为通《经》或自课而已，定稿刊行之事，自可俟诸他日。难得《经雅》之稿经戴震亲笔修改，但许多地方尚需加工，如有些条目的解释过简，显然是仓促之笔，有些篇名出处仅用单字标示，改订的文字亦诸多不清，天头眉批亦不少，整理甚难。其二，书稿辗转数人之手，均未得付梓机遇，而邵晋涵、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辈又相继有杰作问世，其稿作为单行本刊行，更是惟艰。

《经雅》虽未刊行，然此稿专释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博览先秦汉魏古籍，搜罗完备，古今雅俗之称条贯分明。而考辨旧说，屡有发明，其稿又从未面世，其中必有参考价值。

但是，对于《经雅》的价值，还必须历史地来看待它。作为

戴震早年的作品，今天来看，价值已不在有多少发现，因为与戴震同时及其后，受戴震的影响而有重大成就的人已不少。因此，我认为《经雅》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和其他作品一起反映了一位大师的治学道路和所涉足的地方。戴震反对宋明理学之徒的主观理智哲学，认为道不求于《经》之故训、典章制度，而求之于心，是剽袭释氏之言以解儒经，因而自“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见《答彭允初书》）“道不同不相谋”，他认为要知孔孟之道，须先通《六经》语言。于是他早年精研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语言为整理思想最基本的功夫。《经雅》则正是这种观点下实践的产物，说明了他早年对草木鸟兽虫鱼作了系统地研究。

其次，它反映了戴震的研究方法。通过《经雅》，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戴震每辨释一物，必综核先秦两汉群籍，征之《尔雅》和汉儒之说，合诸道而更加以条理之。他的辨名识字功夫不是停留在某字词之间，而是在群籍之间、诸道之间。他曾批评那种简单地“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的作法，认为“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觐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见《与姚孝廉姬传书》）这也就是戴震所强调的，在一事必征之古综其全而核之，巨细必究，信乃有征。《经雅》正是这些论述的实践和结晶。

戴震还强调，治学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方能获得真知。他还反对那种为考证而考证，周旋于一字一物之间而没有思想的人，强调君子治学，当志乎闻道。他曾说：“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见《答郑丈用牧书》）

《经雅》虽只是为考辨名实而作，不过三万言，却是贯穿着他的

这些治学精神的，也是他研究《六经》，寻求圣贤思想，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所以对《经雅》，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它。

戴震晚年曾作书与段玉裁，总结自己研究《六经》孔孟之书三十余年，谓“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接着又感慨地说：

“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此犹舍字义、制度、名物，去语言、训诂，而欲得圣人之遗经也。”（见段玉裁《戴先生年谱》）戴震的治学道路和研究方法，使他成就为一位考据大师和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而他那体民富民的伟大思想，更值得我们永远地纪念。

关于《经雅》，方利山同志的文章谓《经雅》“结合了不少书籍之外的社会知识”，颇令人费解。大抵《经雅》对一些有关的古代俚语、典故之类时有涉及，亦是为了辨名和“博识强记”，但这些也无非都是来自古代文献资料之中，而《经雅》之释名，基本上是采用前人成说。除此之外，不知尚有哪些属于“书籍之外的社会知识”？至于方利山同志谓《经雅》是“较原始和朴素的中国古生物学专著之一”，更是值得商榷。所谓古生物学，其研究对象是保存于地层中的生物化石，古生物学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研究生物化石，了解确定地层的形成次序，了解地壳、地质的状况和发展历史等等情况。而《经雅》的内容旨在考辨名实，与古生物学绝不相谋。此类著作，如三国时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宋代陆佃的《埤雅》和罗愿的《尔雅翼》等，早已开了先河。虽是各有特点，但《经雅》在动、植物的形状、特性等方面的阐述，并没有超出前人的范围。因此，把《经雅》说成是古生物学专著，是令人费解的；加上“原始”二字，就更不合适了。

由于《经雅》是戴震早年写作的，初稿有一些错误和欠妥之

处，如《经雅·释虫》误以《周语上》之“杜伯”为蠹（蠹），《周语》之杜伯当为人名。此白璧微瑕，仍不失为大家之作。

《经雅》之稿流落两个多世纪，难得前哲将其保存完好，归于国库。又值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广为搜罗，纂辑《戴震全书》，使其得见天日，诚为戴氏与学术界之幸。我以为，今研究戴震乃至乾嘉学派，凡戴氏之书存于世者，虽早期作品亦不能忽视，因为这也是戴震治学通往精深之处的一个脚印。

1993年8月于武汉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